

【著书者说】

北京鲁迅博物馆1959年编《鲁迅手迹和藏书目录》显示，鲁迅的藏书共计1.4万余册，其中中文线装书计946种7704册。这自然无法比拟当时的藏书界名流如张元济、傅增湘，也不可同与富贵名流刘承干、袁克文的藏书相比，但是，鲁迅用他的藏书发挥的功效，迸发的思想火花，创造的精神财富，在现代文学史乃至学术史上，却创造了一个高峰。

鲁迅的买书与卖书

卖奖章买书

鲁迅在南京矿务铁路学堂读书时非常勤奋。该校规定每月一小考，成绩优秀的，就发三等奖章；积了三个三等的，换发一个二等奖章；积了三个二等的，换发一个头等奖章；最后，三个头等奖章可换发一个金质奖章。全班得过这种金质奖章的，只有鲁迅一人。

鲁迅得到金质奖章后，并没有戴起来炫耀，而是拿到鼓楼大街卖了。鲁迅说：“金牌保存起来，它永远只是一块金牌，金牌再也变不出其他的东西来。弄得不好，反会使人增加虚荣心，滋生傲气，从此不再上进。而从书里，却可以得到知识。”卖了奖章，鲁迅买回几本心爱的书和一串红辣椒。每当读书读到夜深人静、天寒体困时，他就摘下一个辣椒，分成几片，放在嘴里咀嚼，直嚼得额头冒汗，周身发暖，困意消除，于是又捧起书攻读。

在此期间，鲁迅买了这几年最喜欢的《天演论》。这是一本宣传达尔文进化论的书，是维新派重要人物严复根据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赫胥黎的《进化论与伦理学》译述的。这本书花去了鲁迅500文钱。

所买“大抵常本”

鲁迅所买之书，用他自己的话讲，是“大抵常本”。

鲁迅不是“唯版本论者”。他也不是不想买版本优、品相好的古籍，但囊中羞涩，故所买都是便宜的本子，只要能聊胜于无。对此他也是无奈的，所以日记中常常出现“惜”“劣”“恶”这样的字眼。比如，1912年12月21日，“午后……又往留黎厂（即琉璃厂，下同）……又觅得《晚笑堂画传》一部，甚恶，亦以七角银购致之，以供临习”。对书不满意，但尚能临习，所以买下来了。

1912年年终，鲁迅盘点书账，发出了如下感慨：“京师视古籍为骨董（即古董），唯大力者能致之耳。今人处世不必读书，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，尚复月掷二十余金，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说（同‘说’），亦可笑叹人也。”

这一感慨中既包含着无力致之的无奈，又有“收拾破书数册以自怡说”的自娱自乐。这一年是鲁迅在教育部任职的第一年，半年实习期只能领津贴和半俸，年底转正后才定下每月220元的薪资，全年总收入近1500元。书账中所记“百六十余元”已超过了他的年收入的10%。

北京时期，鲁迅购书于1916年达到峰值，全年共花费496.52元。1919年11月21日，鲁迅及其家人迁入八道湾11号，有了固定的住所，同时，他与周作人的藏书也日渐丰富。书籍增加了，书架当然也要增加，1920年7月24日，鲁迅“买书架六。下午整理书籍”。

1924年5月，鲁迅迁入官门口西三条胡同21号，过了两年，他又买了一个书柜：1926年8月14日，“午往小市买书柜一个，泉十元”。书柜的增加见证着藏书的增加。鲁迅日记中记录买书柜仅两次，这次之外，另一次是居住在上海时的1927年12月23日：“买书柜一个，泉十元五角。”当时，鲁迅迁入景云里23号不久。

1936年10月12日，鲁迅给自己的学生和同乡宋紫佩写信，委托他去西三条胡同查找元人王祜所著《农书》。虽然离开北平已有10年，距上一次探亲相距也已4年，但鲁迅对西三条胡同书柜中的藏书分布还是记得非常清楚：“客厅中有大玻璃书柜二，上部分三层，其上二层皆中国书，《农书》或在其中。”同时，对这部书的外观也描述得非常清楚：“此书外观，系薄薄的八本（大本）或十本，湖色绸包角，白纸印，一望可辨大略。”其时距鲁迅逝世仅有一周。亲自经营之家，不时摩挲之书，远距离指示学生搜检，竟如亲见，令人感佩。

鲁迅在北京的14年时间里省吃俭用，用近4000元来买书。到上海以后，鲁迅的生活安定下来，也有稳定的居所，还有专门的藏书室，书买得尤多，一年常在800元以上，1930年达到峰值，为2404.5元，月均200.375元，而5年前他购买北京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中的那套四合院，才花了不到1000元。

1934年7月10日，鲁迅作《买〈小学大全〉记》一文，记录了自己在上海四马路买到一部清朝禁书《小学大全》的情形，感叹：“钱装书真是买不起了。乾隆时候的刻本的价钱，几乎等于那时的宋本。明版小说，是五四运动以后飞涨的……至于清朝禁书，则就是宝贝，即使并无足观的著作，也常要百余元至数十元。我向来也走走旧书坊，但对于这类宝书，却从不敢作非分之想。”

鲁迅不以最好的本子为搜求目的，所见均是普通古籍普通材料，但即使很平常的版本，鲁迅也能发挥其最大的功效。比如鲁迅著《中国小说史略》是我国小说史研究的开山之作，到鲁迅逝世的1936年10月印行11版。对于这本具有开创和奠基意义的著作，鲁迅说：“说起来也惭愧，我虽然草草编了一本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而家无储书，罕见旧刻，所用为资料的，几乎都是翻刻本，新印本，甚至至于石印本。”在另一处，鲁迅也说：“我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，是先前为了教书糊口，这才陆续编成的，当时限于经济，所以搜集的书籍，都不是好本子。”

飞花落叶都是兵器，出手均是锦绣文章，这才是顶尖高手。

抄书补书

鲁迅是晚清民国时期成就最大的“抄书家”之一。

鲁迅小时候不仅酷爱读书，还喜欢抄书。他抄过很多书。单是关于草木虫鱼方面的书，便抄了《野菜谱》《释草小记》《释虫小记》，而且推广到了《茶经》《未

粗经》《五木经》等。显然，抄书使他受益匪浅。他的记忆力那么好，读过的书经久不忘，这与他抄书的爱好是密切相关的。而且抄书的好习惯，也形成了鲁迅很强的比较、校勘、钩沉的能力。

鲁迅一生抄书的数量，最保守的统计，其字数至少也在100万字以上。仅1915年至1918年，其抄录古碑一项就达790种，近2000张。对甲骨文、金文、真、隶、篆、草各种字体，他都摹写得惟妙惟肖。大量的抄写，对鲁迅的书法是很好的训练。

比如：1915年3月29日，“夜景（同‘影’）写《秦汉瓦当文字》一卷之上讫，自始迄今计十日”。4月10日，“至清秘阁买纸笔，合一元。晚写《秦汉瓦当文字》一卷之下讫，计十二日”。17日，“午后往图书馆还《秦汉瓦当文字》并托丁（同‘汀’）书”。这是花费了22天抄写完《秦汉瓦当文字》后，顺便让图书馆装订。

卖书易书

鲁迅爱买书藏书，偶尔也卖书易书。

第一种情况是卖书救穷。

鲁迅很有经营头脑，在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一文中，鲁迅回忆道，他小时候用一种“荆川纸”蒙在小说的绣像上，画了《荡寇志》和《西游记》的绣像，都有一大本。“后来，因为要钱用，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。”那位同学的父亲是开锡箔店的。

1913年7月13日，鲁迅在绍兴奎元堂以24元的价钱买到一部明代毛晋汲古阁所刻《六十种曲》一部八十册。8年后的1921年4月7日，鲁迅经济困难，就把这套书以40元的价钱卖掉了，当天日记云：“上午卖去所藏《六十种曲》一部，得泉四十，午后往新华银行取之。”鲁迅将《六十种曲》从绍兴带到北京，收藏八年赚了16元，足见鲁迅生存和变通的能力很强，是可圈可点的。

第二种情况是汰冗剔旧。

鲁迅日记1916年1月15日，“下午往留黎厂以山东金石保存所藏（同‘藏’）石拓本之陋者付敦古谊，托卖去”。敦古谊是琉璃厂的一家碑帖店，常上

门给鲁迅送造像拓本。“拓本之陋者”，也就是陋拓本，即拓得不好或没有什么价值的拓本。从性质上看，这属于剔旧。从此举可知，鲁迅对拓本的品质要求很高。到了1918年10月21日，鲁迅与敦古谊又发生了一次交易，有买有卖。卖出《禹陵空石》，又添了3元买了造像。等价交换，多退少补，读来颇有趣味。

第三种情况是处理劣书。

1918年7月31日，鲁迅“往日邮局以券二十三枚引换《殷墟卜辞》一册，阅之，甚劣”。这部被鲁迅评为“甚劣”的《殷墟卜辞》，是加拿大人明义士编印的，1917年3月上海石印。鲁迅对于是书评价甚低，又嫌其价贵，故于9月21日“托刘半农卖去《殷墟卜辞》，得日金券廿元”。鲁迅对甲骨文的鉴别有相当功力，这类价格颇昂又低劣的书籍被处理，当无意外。

第四种情况是出售自己的作品。

上海期间，鲁迅也卖书，但大多是售出自己的作品集，不管是原价卖还是打折卖，都属于经营性行为，和农夫卖出田里的粮食没有什么区别，比如：1932年4月27日，“午后付光华书局《铁流》一八四本，《毁灭》一〇二本，五折计值，共二三元八角，先收支票百元”。

第五种情况是快速易手。

1935年1月10日，鲁迅买得《饮膳正要》一部三本，价一元。但是这本书在鲁迅家仅仅放了一夜，第二天就被鲁迅原价卖给了日本医生须藤五百三，1935年1月11日鲁迅日记：“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，并以《饮膳正要》卖与须藤先生，得泉一元。”鲁迅与须藤来往甚密。鲁迅似乎认为，《饮膳正要》这样的书，更适合放在医生的书架上，于是迅速出手了。

第六种情况是“易取”“作值”交换。

鲁迅收藏拓本之初，有时“易取”“易得”，即作交换。比如1919年4月10日，“至留黎厂，以王树枏专（同‘枏’）拓片易得《崔宣华墓志》，作券三元”。有时习惯以重出拓本作值，购买其他拓片，事实上是先卖再买，根本目的还是为了节约钱。这种情况，日记的最后一次记录是1920年1月16日：“以重出之《吕超志》拓本在留黎厂易得晋郭舒夫人及隋尉娘墓志各一枚，作券四元。”

有趣的是，自此以后，鲁迅再没有将重出拓本和书籍“作值”或“作券”，而是直接赠送朋友，可能与其此时生活改善和自重身份有关。

鲁迅与书店的关系，小而言之，反映的是买书卖书的商品交换关系，大而言之，反映的则是作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——精神消费、人情往来等。鲁迅与各色书店打交道的过程反映着书店业态的荣枯、出版文化的变迁、文坛气候的冷暖，以及世间人情百态，是观察鲁迅生命的一个特殊的窗口。

据《光明日报》（作者：薛林荣，系中国作协会员）

图片选自《鲁迅的书店》
鲁迅（1881年9月25日—1936年10月19日）



1900年冬末，鲁迅重新装订《徐霞客游记》时自拟的卷目和“题跋”

